

惠安文史資料

第三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惠安委员会

文史资料工作组编

惠安文史資料

第三輯

(内部資料 注意保存)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惠安县委员会
文史資料工作组编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一日

目 录

惠安县人口发展概况·····	郭顺龙 (1)
惠安旅緬华侨参加同盟会会员名单·····	惠安政协文史资料工作组 (5)
民初“天主、国民教案”概述·····	王沛生 王淑基整理 (6)
汪柴水匪祸在惠安·····	郑国梁 (8)
土匪汪柴水与民团康伯沧·····	杨昆鹤 (11)
潘清白被汪柴水绑票之经过·····	潘悟真 (13)
惠安著匪之三——李法·····	洪满聪 (15)
“福建人民政府”的“惠安县文化大同盟”·····	陈书涛 刘剑锋 (20)
十九路军与蒋军在惠安之战斗·····	惠安政协文史资料工作组 (23)
追忆抗日战争中郭志雄烈士牺牲概况·····	许祖义 综合整理 (24)
抗日阵亡之张稚生营长·····	张仰谦 何云瑜 (27)
惠安抗日第一巡回宣传队·····	卜继业 (29)
“五·卅一”日机轰炸惠安纪实·····	杨世晖 庄澄甫 (31)
日寇和国民党反动派蹂躏峰尾的罪行·····	刘伦岩 刘锡筹 刘雪赋 刘锡定 刘三英 (33)
日本侵略军在崇武的“七·一六”大屠杀·····	惠安政协文史资料工作组 (35)
伪福建省海上保安纵队第四支队之起义·····	黄连茹 (37)
爱国华侨、粹心教育的黄泰楠先生·····	惠安县惠南中学 惠南中学董事会整理 (39)
孙庆珍先生兴学记·····	孙怀伟 (41)
惠安回族——白奇郭·····	郭秋君 (43)

台湾伊斯兰教来自大陆.....志 诚(49)

惠安县戒烟医院.....庄澄甫(50)

惠安防疫所.....庄澄甫(51)

惠安县名初考.....洪满聪(52)

惠安城池之兴废.....陈书涛(54)

惠安县堂《戒石铭》.....庄澄甫(57)

惠安城关四大名亭.....郑国梁(58)

惠安风池之今昔.....潘悟真(61)

洛阳古桥大观.....张主示(62)

昭惠庙记.....张 航(65)

建筑名匠王益顺.....惠安政协文史组整理(66)

惠安“普度”带来的灾害.....郑仰侨(68)

掷石赶“蜂”.....何云瑜(70)

附：《惠安文史资料》第二辑勘误

惠安县人口发展概况

郭 顺 龙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生产本身包括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须的工具有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蕃衍。”（《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页）前者是物质资料的生产，后者是人口的生产。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为了维持自己以及后代的生命所进行的生产，其结果是从自然界取得满足人类生存所需要的生活资料。人类自身的生产是人类为了世代延续所进行的生产，其结果是新生命的产生。

在惠安这块972.7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从北宋太平兴国六年（公元981年）建县以来的一千多年的漫长岁月中，几经沧桑，人口由衰而兴。特别是解放以来，人口的繁衍越来越快，增加的绝对数越来越大。

据县志记载，我县在建县后十四年的北宋至道元年（公元995年），才开始建立户口版籍制度。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把户口分为“主户”、“客户”。有土地的是“主户”，其中包括地主和自耕农；没有土地的是“客户”，其中以佃农占多数。以上了十六岁的男子为成“丁”，以丁力多寡科差。在南宋淳熙年间（公元1174——1189年），全县有主户30076户，丁39665人，客户6794户，丁9442人，主客户计36870户，丁49107人。但丁口合计数并未记载。看来在南宋时期，宋室南迁，定都临安（杭州），东南部人口激增，就户数推算，当时我县丁口应在10万以上。

到了元朝，人户分为十等，立科差法。由于战乱频繁，元兵屠杀，人口消减，到元末至正年间（公元1341——1368年），减为8055户，丁口4万多人。

“明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颁黄册式于天下，令军、民、盐、匠等户各以本等名色占籍。”至嘉靖元年（公元1522年），全县黄册军、民、盐、匠等籍

总计4549户，丁口38831人（其中民户2833户，丁口16210人；军户1368户，丁口18295人；盐户154户，丁口1471人；匠户155户，丁口2514人；弓兵户29户，丁口255人；铺户9户，丁口73人；医户1户，丁口13人）。至万历四十年（公元1612年），黄册军、民、盐、匠等籍总计4314户，丁口30795人。在公元1368年至1612年的二百四十四年间，人口不但没有增加，而且连续下降，从10万多人减少到3万多人。这和倭寇侵袭、灾疫流行、民不聊生有关。

清初休养生息了一段时间，人民生活相对安定。康熙五十二年（公元1713年），曾“恩诏以五十年丁册定为常额，此后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题准随田匀丁，民甚便之”。所以，“生齿日繁”。故而至乾隆三十二年（公元1767年），全县已发展到有67个铺，31254户，丁口243351人。从公元1612至1767年的一百五十五年间，人口增加217859人。

到民国二十三年（公元1934年），全县有41629户，330441人。民国三十年（公元1941年）九月，全县总人口为390947人。从公元1767年至1941年的一百七十四年，人口增加142293人。

1949年解放时，全县为104843户，429315人。从1941年至1949年的八年间，人口增加38368人，增长9.8%，平均每年增加4796人。这时正是抗日战争和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抓丁派款，加上灾疫流行，所以出现死亡率高、增长率低的情况。

1952年建政时期，全县设14个区，222个乡，共108053户，458453人。三年增加29133人，增长6.79%，平均每年增长2.26%。

合作化时期，1957年全县为73个乡，514个高级合作社，477个初级合作社，共112445户，524887人。五年增加66434人，增长14.5%，平均每年增长2.9%。

这一时期，正是我国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人民生活安定，医疗卫生条件改善，我县五十年代出现了第一个生育高峰，1954年出生率高达51.4%，1957年出生率达40.8%。我县人口再生产类型由解放前的原始型——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转变为过渡型——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

1958年人民公社化，1959年全县并为红旗、飞跃、上游、东红、超先等5个人民公社，12个管理区，244个生产大队，共113692户，556578人。1961年10月，

全县分为城关、黄塘、洛阳、东园、张坂、涂寨、崇武、小岞、净峰、东岭、辋川、山腰、后龙、南埔、涂岭等15个公社，387个生产大队，共121164户，581622人。

到1983年底，我县人口已达196538户，976764人。预计到1985年，我县人口将超过100万人。

解放后，我县同全国一样，于1953、1964、1982年进行过三次人口普查。现以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数据，与1964年对比，分析一下我县人口的特点。

一、人口基数大，密度高。第三次人口普查为936227人，人口数量居全省第四位，仅次于莆田、南安、晋江等县。人口密度，平均每平方公里962人，也居全省第四位，仅次于晋江县、福州市、漳州市。比全国平均每平方公里107人高9倍，比全省平均每平方公里213人高4.5倍。

二、人口年龄构成轻，青少年占多数。我县第三次人口普查，0—14岁年龄组占全县总人口的39.75%，65岁以上老人占总人口的4.25%。全县人口年龄中位数为18岁，就是说18岁及18岁以下的青少年占总人口的一半。同时，0—33岁，即解放后出生的占总人口的73.69%。由于青少年占多数，预示着我县人口增长的潜在力大，人口再生产呈增加型特征。

三、自然增长率高。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为936227人，比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的595479人，十八年增加340748人，增长57.23%，平均每年递增2.5%；比1949年，三十三年增加506912人，增长118%，平均每年递增2.46%。自然增长率高于全省、全国的增长水平。妇女终身生育率很高，50—64岁妇女终身生育率平均为5.08胎。1981年15—49岁育龄妇女220826人，有生育的23321人，平均生育胎次为3.28胎。多胎比例占33.04%。

四、少数民族增长速度比汉族快。我县有六个少数民族。人数较多的回族11957人，占我县总人口的1.28%。畲族264人，占0.028%。此外还有壮族、侗族、黎族、高山族，但人数不多，都在10人以下。与1964年相比，十八年来，汉族增加335661人，增长57.05%，少数民族增加5090人，增长71.14%，其中回族增长71.04%，畲族增长89.92%。从增长速度看，少数民族比汉族快。这主要是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少数民族经济发展得到支持和照顾，权利和风俗习惯受到尊重，

在人口普查时，如实申报了少数民族成分。

五、男女性别比例基本平衡。我县男女构成是男占总人口49.13%，女占50.87%，女比男多1.74%。如以女为100，男：女=96.2：100，女比男多3.75人。主要原因是我县侨属多，65岁以上老年妇女比老年男人多16430人，老年性别比例为男：女=45.35：100。

近来，大家对婴儿的性别比例很关心。我县0—5岁婴幼儿性别比例如何呢？据统计，男：女=103：100，这是正常的。因为出生婴儿中男婴儿比女婴儿稍多，一般来说，出生婴儿性别比例为男：女=105：100，分性别的不同年龄组，死亡人数和死亡率都不同，一般来说，30岁以下各年龄组的男性死亡率比女性高，进入结婚生育期，男女性别比例大体趋于平衡。30—50岁女性死亡率比较高；50—80岁男性死亡率较高，所以老年妇女较多。我县婴幼儿的性别比例是正常的。

六、人口质量有明显提高。由于党和政府的关心，人民的生活条件和医药卫生条件的改善，健康水平提高，体质普遍增强，死亡率降低，平均寿命提高。我县人民1982年的平均寿命为69.33岁，男65.45岁，女72.37岁，比全省平均寿命68岁高1.33岁。

同时，文化水平也有了提高。第三次人口普查时具有各种文化程度的人口同1964年普查时相比，变化如下：大学的增加1353人，增长1.63倍；高中的增加21586人，增长2.75倍；初中的增加30303人，增长2.51倍；小学的增加182856人，增长1.2倍。每十万人中各种文化程度人数如下：大学236人，比1964年增长0.59倍；高中3142人，增长1.33倍；初中8897人，增长1.2倍；小学35878人，增长0.39倍。每十万人中文盲、半文盲下降0.19倍。但是，与全省平均水平相比，每十万人中，大学的少372人，低61.14%；高中的少2567人，低44.95%；初中的少3609人，低28.62%；小学少455人，低1.75%。

总之，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诞生、经济建设的发展以及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我县人口平均寿命提高，年龄结构轻，由1953年稳定型向增长型发展。1949年至1932年三十三年净增长数超过解放前近千年的净增长数，超过解放时全县的总人口数。人口增长速度的快慢，直接关系到全县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关系到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因此，我们必须切实做好计划生育工作。

写于一九八四年七月

惠安旅緬华侨参加同盟会会员名单

惠安政协文史资料工作组

我组在征集惠安文史资料中，从晋江地委统战部得“惠安旅緬华侨参加同盟会会员名单”一份，实为难得的革命历史资料。今值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前夕，予以刊登，以作纪念。

据名单，惠安旅居緬甸华侨参加同盟会的计三十九人，包括各人的入会底号、姓名、年龄等项。至于各人参加同盟会的时间（中国同盟会成立于一九〇五年八月，一九一二年八月改组为国民党），他们从事革命活动的情况，以及他们在惠安的原籍故里等，今尚未详，有待继续调查。在此，希望海内外知情的同胞，给予协助，提供资料。

惠安旅緬华侨参加同盟会会员名单

入会底号	姓 名	年 龄	入会底号	姓 名	年 龄
37	曾 逃		55	杨 益 裕	30
59	陈 加 丝	37	72	陈 文 胞	21
104	张 木 术	47	109	张 为 本	40
121	曾 庙	21	152	曾 玉 专	30
153	曾 鹏 飞		158	张 文 棹	22
340	张 炳 漳	35	468	曾 文 谕	24
510	张 读 汉	22	534	汪 骥	41
574	杨 董	40	720	曾 凯 军	37
740	黄 汉 龙	23	762	王 万 春	20
782	张 云 卿	31	820	杨 燕 水	
834	黄 复 汉	29	852	陈 天 勋	22
922	何 光 添	25	1258	王 妈 发	25
1331	林 赤 如	17	1406	王 春 矮	24
1432	陈 乌 返	23	1441	庄 文 红	41
1442	骆 妈 发	34	1586	林 根	22
1587	王 春 发	22	1738	澄 汉	20
1739	恢 汉	34	2059	郭 约	33
2154	陈 文 质	40	2217	曾 鸿 恭	31
2213	乐 清	24	2219	骆 文 龙	36
2264	曾 文 照	25			

（本文原载于八一年十月《惠安文史资料（初稿）》第一本）

民初“天主、国民教案”概述

王炳元 王焕章 等人口述
王沛生 王淑基 整理

编者按：“天主、国民教案”经过，在《惠安文史资料》第二辑（一九八四年三月十日出版）《惠安的两起教案》一文中有所叙述。今王沛生、王淑基二同志根据自己所闻及深入调查，撰写此较为完整的资料，可作以前发表资料的补充。

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侵华势力肆无忌惮，其先驱则借传教之名，横行沿海、内地，遍及城乡。清末，惠安城内已先后建立基督、天主两教堂，其他集镇或较大村落也设立不少会所，至于牧师、神甫等上层神职人物，则由国外教会派洋人充任。

清末、民初地方政局动荡不定，且历来官府大多崇洋媚外，对洋教会的胡作非为，或支持，或听任，故信奉该两教派的教徒迅速增长。盖当时信教者皆各有其动机，其中多为受苦人民，企图摆脱苦难，寻找精神寄托，沾点教会势力以利生存；少数则为地方士绅豪富，妄图依仗洋人势力，拉帮结伙建立集团，以横行乡曲，鱼肉人民，或希冀在贸易经商方面挤进洋行的代理行列，以谋势利。教会实力一经发展，确也出现一些诸如开办学校、建立医院等事业；但却也滋生了教徒与非教徒之间、两派教会之间的磨擦、纠纷。一旦发生教徒与非教徒的争执时，教会往往出面干预，袒护教徒，致使教徒依势逞强，占得便宜，非教徒则难免吃亏，甚而毁家损财者有之。

这里所记“教案”一事，乃发生于一九一三年（民国二年）秋至一九一四年（民国三年）年底。在当时县城东门外马路顶古驿道东侧有一处贩卖驴马柴草的所在，俗名叫做“驴仔埔”，其邻近有一所酿制地瓜酒的作坊，业主名叫陈送，一九一三年因扩充营业所需，在驴仔埔边空地挖一酒糟坑。由于坑穴所在逼近奎巷王姓祖祠后壁，王姓族人认为大伤“灵脉”而出面阻止。但陈送却以为自己是天

主教徒，不信“风水”，旋即挖掘完成。随后，奎巷族人众议纷纷，公推族长王貽乔（即王炜奎，系前清秀才，民国初年曾任过漳平县知县）率诸同族丁壮数十人，挑土将该糟坑强行填平。于是，双方发生一场口角。此时，陈送因感势单力薄，故立即进城找天主教会的神甫石心熙（据说为意大利人），渲染事态经过，吁请救援。该神甫迅即召集教徒百余名，汹汹奔出东门，到现场挑起殴斗，驱散了奎巷村王姓族人。越日，奎巷族长王貽乔因事进城，路过八间街时突与天主教徒王柳生（乃奎巷村王姓本族人）等人相遇，竟被谩骂侮辱，且欲将其扭送天主教堂让神甫制裁发落。好事者围睹甚众，且有人奔报奎巷村。奎巷村立即鸣锣集合数十青壮年持械冲至八间街，奋力夺回王貽乔，追逐王柳生等教徒。顿时，市面商铺秩序大乱，惊动了守城驻军、县衙。消息传出，遂使事态不断蔓延，一发难以收拾。

在双方僵持不解之时，天主教神甫不断对当时惠安知县萧浚提出交涉，多方施加压力，要其派兵进行弹压。萧知县曾以“查勘”为名，带了兵丁到达奎巷村进行一番勒索（如家家户户要办香案、送草鞋礼犒劳兵丁等），又把奎巷村族人王天尝抓捕入狱。后来又多次单方传讯奎巷族人代表王貽乔、王孝慈、王晋元等头面人物，恐吓压制。这时，奎巷村则相继派人到泉州、福州等地，疏通上诉，初步得到泉州府叶提台和福建省李督军的重视。据云叶提台且面许王貽乔，如若事态恶化，他将派军队来惠支持。可是，当在福州经商的奎巷村王藩专程带来李厚基军阀政府支持的信息回惠之际，由于消息走漏为教会侦知，教会竟然在驿坂地界截途捕掳，押进县监狱。此时奎巷全村人心惶惶，极为紧张。但也激起了全县社会各界的义愤，声援者由王姓而扩及他姓，由城关而扩及农村。

经过几个月的演变酝酿，以王貽乔为首偕与国民党有关的各方人士，共商组成一个“国民协会”，先会同城关及邻近的东张、陈芹王姓宗族及其他民众严阵以待事态的发展。一九一四春正、二月间，“国民协会”聚众数百人，冲进县城围攻天主教堂，迫使惠安知县从狱中释出王天尝、王藩。天主教神甫眼见“国民协会”势力日盛，亦不甘心示弱，一面唆使教徒在园内、四股、东寨、芹坑等地并扩及全县范围组成了对立营垒，寻衅纠纷。双方聚会频繁，大规模械斗有一触即发之势。另一方面，教会又经外国驻华使节，广为宣传，并电告教廷，要求

通过外交途径向中国当局提出抗议，催迫惠安知县采取手段解散“国民协会”，惩办其所谓肇事者。据传当时确有外国战舰入侵至惠安崇武、秀涂、獭窟诸海域，游弋示威……

旷日以待的事态，不断演化、升级，看来已从封建“风水”之争，逐渐转化为反洋人反教派运动，由惠安一隅影响至民国初年的执政当局，双方当事者确也弄得疲惫不堪。延至一九一四年底，惠安萧浚知县早已他调离惠，陈送的酒坊也改营为磨坊，双方怨气渐消，天主教会也感到在惠安严重影响其教徒的增长（此期间，信天主教者无甚增加，基督教便乘机加快发展），双方只好同意由地方士绅陈伯谋（陈蓉光之父，其时正当得势）出面调解斡旋。此一“教案”虽逐渐平息下来，但它却给惠安人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增添了人民对洋人行径的认识。

一九八四年八月

汪柴水匪祸在惠安

郑国梁

汪柴水，又名汪汉民，惠安东门外后坊村人，是民国初年惠安四巨匪（汪连、汪柴水、杜建、李法）之一。而四巨匪中，汪柴水这股土匪对惠安的祸害尤烈，横行惠安前后达十五年之久。当时惠安人民在这股土匪蹂躏下，过着极其悲惨的日子。今就当时亲身所见所闻，对汪柴水为匪罪祸种种，作一简要忆述。

投靠汪连

汪柴水曾先后肄业于惠安县立中学和厦门集美学校师范科。一九一八年，集美学校发生校潮，他即离开学校前往晋江安海投其老同乡汪连（时任闽南民军的连长）部下当文书。不久，随汪连到凤巢山（闽南民军的根据地，在晋江、南安、同安三县边界）。当时民军成分良莠不齐，兵匪合一，在凤巢山民军中有被号称“二

十四杀”的凶汉，汪柴水就是其中的“一杀”。从此，汪柴水开始了亦官亦匪的生涯。

盘踞田船

后来，汪柴水回到惠安，便把惠西田船作为匪巢，进行土匪活动。为了充实党羽，扩张实力，他从邻近各村各征抽壮丁二至三名，在他匪部充当匪卒。在他田船老巢中，经常拥有匪卒四百多人。他又巧立名目，向各村征收所谓“联络税”，按户抽收，下户每年二元，上中户每年八元。当时惠西一带被迫跟他“联络”的计有大小六百余村，这笔“联络税”是相当可观的。敲财的另一办法是操纵走私盐，对各村贩卖私盐的每担抽成二角。又勒索各村农民大种鸦片，鸦片收成后统统归他收购，然后制成“烟饼”，运往浙江温州等地出售，换取枪枝弹药。汪柴水敲勒索得来的钱，全由他的心腹汪达卿经管。据说每日所收银元，数量难以计算，只在室内挖筑几个大银窖，用竹箩装银元倒入窖里，经常银元满窖。在他抽丁派款、破坏田园生产的情况下，惠西一带群众过着苦难深重的日子。

绑票勒索

汪柴水经常的土匪活动是绑票勒索（绑票的同时也抢劫财物）。被绑架的群众，匪徒称之为“鲎仔”（即肉票）。每个鲎仔少的要被勒索赎身银数百元，多的至数千元。当时汪柴水的匪爪伸向惠安各个角落，他的匪徒到处绑架群众，连老人、小孩也难幸免。村下王双法就是在八、九岁时被绑去的。汪柴水还经常派出他的心腹号称“龙卫连”的连长率领匪徒在惠（安）枫（亭）洛（阳）公路上劫车绑架群众。城关人陈雪华、柯联定、张昆友及王孙村黄森等七人，就是在惠洛段公路上遭劫车被绑去的。有一次，汪柴水派他的牙爪乘汽车来包围城关东门外奎巷，一下捕去成人、小孩二十多人。汪柴水除自己派出匪徒绑架群众外，还向仙游等地散匪“收购鲎仔”，每个“鲎仔”估计可以勒索赎身银多少，按百分之二十为收购价收进，然后转手勒索。又把在惠安抓到的小孩卖给外县以取财，拆散人家骨肉。在那土匪横行的日子里，虽然在白天，人们出城一、二里，或到科山寺去，都要提心吊胆，恐为土匪绑架，连乘汽车也视为畏途。

汪柴水生性极其残忍，为了“保密”和加深“鲎仔”的恐怖心理，更为了逼使“鲎仔”的亲属尽快筹款赎回亲人，对“鲎仔”施行种种残酷的刑罚。他把抓来的“鲎仔”用布条蒙住眼睛，用布块塞进口中，用蜡灼油灌进耳中，今天关禁在这个山头，明天又转移到另一个山头，往往连续换了好几个山头。他设有土牢、水牢，把“鲎仔”关禁在里面，严刑拷打。据村下王双法忆述，他被汪柴水抓去时，关在水牢里，匪徒问他要吃签（一种豆制扁平条状食品）或是要吃面（指面线）（土匪黑话，吃签是“打”，吃面是“吊”），经过几天的折磨，赎回时他的四肢严重浮肿，连大人穿用的裤子也穿不进去。汪柴水夜夜打麻将，一时兴来，即令四名“鲎仔”头上各顶灼火，蹲在麻将桌四个角的旁边，给打麻将的匪徒照明，一直到天亮。他还制成几个大木桶，桶内放蛇，把“鲎仔”投入桶中，以致有的“鲎仔”被惊得神经失常，变成呆子。对于无法赎身的“鲎仔”，即被杀害，土匪称之为“撕票”（即撕掉钞票的意思）。被刑打致死或被杀害的“鲎仔”，屡见不鲜，上述遭劫车被绑架的城关人张昆友，就是被汪柴水杀害的。

“清党特派员”

汪柴水亦匪亦官，混迹于军阀派系中，由充当汪连的连部文书起家，先后当上排长、连长、营长、团长。时人称汪连为“老团”，汪柴水为“新团”。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公开叛变革命。五月间，汪柴水自省城福州打着“拥蒋护党”的旗号，以“清党特派员”的头衔，率领匪卒，耀武扬威地进入惠安县城，驻扎于惠安县立竞新小学（今县教师进修学校校址）。一下马，就多方破坏共产党地下组织。同时又进行抢劫绑架。城关商户林振堂、张光明、绅士陈镜湖等都遭绑架。后来林振堂、陈镜湖各以白银五千元赎出，张光明以白银一千元赎出。汪柴水还利用当时商会会丁陈九昌为耳目，摸清各商户家底，挨户科派巨款，大肆横征暴敛。

“六六惨案”

一九二九年六月六日（农历四月二十九日），惠城驻防军调防，汪柴水获得汪连暗中送来情报，乘城关防务空虚，从田船倾巢出动，率匪徒三百多人进入县

城，大肆掳掠奸淫。布商益成号(益隆)、通源号(汪才)、晋发号(林情)、义记(黄来兴)等十九家大商户遭洗劫，其他商户民宅一并波及。被绑去的商人有郑接、火司、郑目、陈添、王蛋等十三人，后来各以千元至数千元的巨款赎出。在匪祸恐怖中，满城哭声，惨不忍闻。这是惠安有史以来的空前浩劫，后称“六六惨案”。至今惠城年老居民想起此事，还会心悸色变。

天网恢恢 疏而不漏

一九三二年，汪柴水在仙游县枫亭被陈国辉打败，逃回惠安田船，把枪枝弹药埋藏地下，分存财物，遣散爪牙，随身收拾部分细软、银元，逃往福州，再转逃上海。在上海时，多方钻营，结识了当时上海警备司令吴铁城的小舅子，由吴的小舅子把他藏匿在吴的官邸里。但后被惠安旅沪同乡会跟踪发觉，于是惠安群众及旅外人士叠呈吴铁城控告汪柴水的为匪罪行，要求惩办。吴慑于民愤，乃于是年十月下令逮捕汪柴水，绑赴龙华路龙华机场枪决。恶贯满盈的匪徒，落得可耻的下场。

写于一九八二年三月

土匪汪柴水与民团康伯沧

杨 昆 鹤

汪柴水，字汉民，惠安东门外后坊村人。自小入私塾，后转入集美学校，因不守校规，被开除。民国七年(一九一八年)，那时柴水才十九岁。“靖国军”兴，闽南遍地“民军”，柴水邀同学黄则强(南安罗溪人)投入汪连部下为文书。未几，黄则强回罗溪，自备步枪二十杆向汪连领一连，而柴水为副连长，由此在南门外以抢劫为生。旋“靖国军”失败，退入凤巢山，而则强病死。至民国十二年(一九二三年)，编入陈肇英部。从此柴水已拥有步枪二百余杆，回惠安，

入田船与当地陈敲、苏自来、苏伟、许北山结为兄弟，借当地土豪势力，盘踞田船。后汪连归编孔昭同，许汪柴水为第一营营长，所有汪连之基本势力，皆归汪柴水。至民国十五年（一九二六年），汪柴水归编东路军第五游击队为副司令。及新编军解散，汪柴水逃回田船，时汪连已死，乃大收特收汪连旧部李法、杜建、苏妈来等部集中田船。初以绑票为收入，东至崇武，北至枫亭，均为其横行场所。后感觉利不及费，乃创办联络乡于惠西，从北发展至涂岭，与王云樵、章寿卿合作，共六百余村。每季上户四元，中户二元，全年派饷两次。然惠西北乃贫瘠之地，村民压于土豪之势，时有烦言。柴水乃发动全面种烟苗，自出资买豆饼一万斤放贷，农民至鸦片收成时才清还。于是惠西透十二路尽成鸦片产地。柴水再设立收税站六处，由军需配合连长，到处收账派捐，并收购鸦片，由许埭、峰崎程福生等运往温州等地出售。汪柴水遂拥有大笔巨款，同时在外间以鸦片换来之卜壳枪不计其数。于是又开造枪厂，每日可出品步枪两杆。又引诱田船居民走私食盐，获取暴利，汪柴水则从中盘剥。逐渐成为惠安大股积匪。

一九三二年十九路军入闽后，汪柴水逃居上海，是年冬在上海被捕，枪毙于龙华，时年三十三岁。汪柴水在惠安倒行逆施前后计达十五年，曾一度攻入惠安县城和涂寨镇，奸淫掳掠，残杀无辜，其祸之惨烈，至今惠人言之犹有余栗。

自康伯沧组织民团，自任民团总后，即盘踞惠安东南区域，假借办民团，树立其武装力量，残杀敲诈惠民，其祸之惨烈，尤有甚于匪祸。

康为惠安小岞前内村人，出身于渔霸家庭，曾毕业于北京燕京大学，一九二三年曾企图任惠安县立中学校长未遂，即于惠安东门外东张村陈、王两姓祠堂内，创办一所“惠安私立螺阳中学”，同时借办学为名，亲往南洋向惠安旅外华侨劝募，所得巨款，挟归厦门，在鼓浪屿日夜豪赌，不一二个月，把华侨捐献之款，尽数输光。该校无法维持，宣告倒闭。于是转而勾结官吏，组织民团，自任民团总。那时汪柴水正盘踞惠西北，彼则公然割据惠东南，兵匪不分，扰害惠安，又与汪柴水争据地盘互相残杀。康盘踞惠城、东园、涂寨、洛阳、崇武一带，柴水则盘踞惠西田船，惠北驿坂、岭涂以上地区。连公路线也平均霸占。柴水仇视东南地区，凡康派之人，尽行杀害；伯沧则仇视西北地区，凡属汪派之人，便尽灭绝。故酿成一九二九年农历四月二十九日汪柴水洗劫惠城及涂寨之惨祸。

观汪柴水的离惠宣言，指摘惠安民团总康伯沧之罪状，可知惠安人民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兵匪祸连怨结，殃及人民之概况。追源究底其祸患原因，不难洞见。兹摘录汪柴水宣言的一段如下：“汉民不幸生当弱小，汉民有幸生当乱世。读书不成，治兵无状，相率患难兄弟，待罪兵间十有三年，自惭迂拙，伏处草莽，寄身田船，以俟招安。未若我伯沧兄之文采风流，左右其人皆大学英材，济济彬彬，为吾惠之盛。汉民拭目东望，以为伯沧兄既统民团，且包办党政，必为惠安造福，郅治之隆，可见于一时。宁知以民团为名，行殃民为实，到处掳‘汪派’。岂有巨商富户肯交陪土匪耶？伯沧兄所拘禁之‘汪派’，冤哉！汉民不但不识其人，连名字都罕闻。伯沧兄抚心自问，余之所言，然耶？否耶？若论蹂躏惠安父老，则汉民与伯沧兄中分其咎。汉民一息尚存，合当函告海外惠侨，一致声讨。汉民当率兄弟，愿为前部与伯沧兄周旋，藉赎前愆。谚曰：‘一夫不可狃’，莫谓你等无灭日也。”

（本篇原载于一九六三年七月《惠安文史资料》第二辑）

潘清白被汪柴水绑票之经过

潘 悟 真

著匪汪柴水之经常、大量的土匪活动是明火执仗，抢劫财物，绑架群众，勒索赎身银。而潘清白之被绑票，则是汪匪施用嫁祸于人的狡诈手段，以遂其目的者。

潘清白历任惠安时化小学教员、校长三十二年。一九二七年因回晋（晋江）北水磨村老家探亲，路过蓝田（田船），被汪柴水瞥见，汪乃与其军师苏匡伟密谋绑架。农历十月二十三日，潘自水磨村动身回校，至蓝田时，汪柴水佯作亲善，请潘入室饮茶。茶话间汪暗中布置二匪卒认识潘清白，嘱至小桥埔（莲坑附近）伺候，待潘到达时即予绑票。少顷，苏匡伟入谓潘曰：“近日王朝英（按：当时